

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

周振甫選注

李商隱選集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李商隱選集/周振甫選注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2. 12

(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)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468 - 2

I. ①李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唐詩—詩集 IV.
①I222.74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091807 號

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

李商隱選集

周振甫 選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張 15.5 插頁 5 字數 390,000

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3,1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468 - 2

I · 2564 定價: 49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前 言

《唐人選唐詩》十種中，唐末韋莊選的《又玄集》、韋穀選的《才調集》裏都選了李商隱的詩，尤其是《才調集》裏選了李商隱詩四十首，選得比李白的二十八首、白居易的二十七首多得多。韋穀在敘裏說：“暇日因閱李杜集、元白詩，其間天海混茫，風流挺特。”但他對李白、白居易詩選得不多，對杜甫詩一首未選。紀昀在《四庫提要》裏指出：“實以杜詩高古，與其書體例不同，故不採錄。”它要選的是“韻高而桂魄爭光，詞麗而春色鬪美”，認為商隱的詩，是符合這個要求的，在韻高詞麗上商隱已占相當高的地位。但當時李、杜的地位早已確立，所以他雖不選杜詩，在序裏不得不首先提“李杜集”。李、杜作為偉大詩人的地位，在中唐已經確立。元稹在《杜君墓系銘序》裏稱：“時人謂之李杜。”韓愈在《調張籍》裏提到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。”正由於在光焰萬丈的李、杜照耀下，使得後來的詩人難以措手，所以韓愈在《薦士》裏說：“勃興得李杜，萬類困陵暴。後來相繼生，亦各臻闢奧。”李、杜以後的詩人，各各要別闢闢奧，另開新途。韓愈以文為詩，呈奇崛之態；白居易提出“風雅比興”，他的歌行繼承四傑的音節流美，加以風情取勝；李賀以鯨吸鰲擲的虛荒誕幻呈現奇幻的色采；李商隱以儷葉駢花的駢儷文為詩，加以精純，卓然成為晚唐詩壇一大家。所以崔珣《哭李商隱》稱：

“虛負凌雲萬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開。”又稱：“詞林枝葉三春盡，學海波瀾一夜乾。”把商隱的去世，稱作詩壇無人。在杜甫成為詩聖以後，葉夢得《石林詩話》稱：“唐人學老杜，惟商隱一人而已，雖未盡造其妙，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。”既稱精密華麗，說明商隱與杜不完全相同，實際上不僅是學杜第一，並且是學杜而自成風貌。葉燮《原詩》：“七言絕句，古今推李白、王昌齡。李俊爽，王含蓄。兩人辭、調、意俱不同，各有至處。李商隱七絕，寄托深而措辭婉，實可空百代，無其匹也！”這樣推尊商隱，雖未免稍過，亦可見商隱詩的為人尊重。吳喬《西崑發微序》：“夫唐人能自闢宇宙者，惟李、杜、昌黎、義山，義山始雖取法少陵，而晚能規模屈、宋，優柔敦厚，為此道之瑤草琪花。”指出商隱詩在李、杜外能獨闢一種新的境界，可與韓愈抗衡，這是很有見地的評價。商隱的詩真是詩國中的瑤草琪花，藝苑中的奇葩。

一 李商隱的詩文

韓愈以文為詩，加以奇崛，在李杜外另辟新徑。錢鍾書先生提出商隱“以駢文為詩”，足與韓愈比美，這是論商隱詩的從來沒有人看到的，是錢先生的創見。因此，在談商隱詩前，先談一下他的駢文。

（一）清新峻拔的駢文

商隱在《樊南乙集序》裏說：“此事非平生所尊尚，應求備卒（猝），不足以為名。”他認為他的四六文，應府主的要求倉猝寫成，不值得稱道。因此章學誠在《李義山文集書後》引了上面的話，說：“蓋有志古人，窮移其業，亦可慨也。”說明商隱的志趣不在這裏，這也有助於說明他不滿於在幕府中的生活。但這不能說明他的四六文的突出成就。章學誠又說：

辭命之學，本於縱橫。六朝書記，文士猶有得其遺者。至四六工而羔雁先資，專爲美錦，古人誦詩專對，言婉多風，行人之義微矣。然自蘇（頌）、張（說）以還，長辭命者類鮮特立之操，則詩人六義之教不明，而興起好善惡惡之心，學者未嘗以身體也。徒取其長於風論，以便口給，孔子所由惡夫佞矣。

在這裏，章學誠誤信《舊唐書·文苑傳》說商隱“無特操”，所以提到“長辭命者類鮮特立之操”，貶低商隱的四六文是“羔雁先資”，等於府主送人禮品前的禮單，沒有“言婉多風”的作用。這樣說是不符合實際的。按商隱的四六文，往往駢散結合，有情韻聲勢，高出於當時的四六文，可以稱爲駢文。

朱鶴齡對商隱的四六文是有研究的，他在《新編李義山文集序》裏說：

唐初四傑以及燕（張說）、許（蘇頌）諸公，踵事增華，號稱絕盛。其體裁宏博，音響琳琅，較過前人，而清新俊拔，則微有間焉。……義山四六，其源出於（庾）子山，故章摘造次之華，句挾驚人之豔，以磔裂爲工，以纖妍爲態。迄於宋初，楊（億）、劉（筠）刀筆，猶沿習其制，誠厥體中之栴檀（香木）薝蔔（香花）也已。若夫雪皇太子書、論劉稹檄，則侃論正辭，有風情張日、霜氣橫秋之概；及讀張懿仙一啓，又見其悟通禪悅，所得於知玄本師之教深矣。此豈區區妃青儷白、鏤月裁雲者所能及，而唐史稱其文，第以繁縟恢譎目之，豈得爲知言哉？

在這裏，朱鶴齡認爲初唐王、楊、盧、駱和張說、蘇頌的四六文同六

朝的浮靡不同，內容宏博，音節響亮，突破六朝，可是清新俊拔還不够。這裏，含有商隱的四六文和初唐作者的又有不同，即具有清新俊拔的風格。又指出商隱的四六文出於庾信，庾信時還沒有四六文的名稱，只稱為駢文或麗辭。庾信的駢文有兩方面：一方面是“清新庾開府”，一方面是“凌雲健筆意縱橫”。朱鶴齡指出他有清新的一面，也指出他句挾驚人之豔，實際上也包括了這兩方面，所謂“侃論正辭”，“霜氣橫秋”，就指後一方面，所以稱為香花。從章學誠的話裏，有輕視四六文的意味，所以錢先生說“商隱以駢文為詩”，而不提四六文。商隱的四六文確實高出於一般的四六文而當稱為駢文。至於說“以磔裂為工，以纖妍為態”，割裂典實，陷於纖靡，這是商隱四六中偶有的小疵，並不損害瑾瑜的美好。

商隱的駢文清新而不浮靡，挺拔而不纖弱，華藻而不淫蕩，雖稱四六而駢散兼行，托體較尊，有情韻之美。他在《樊南甲集序》裏說：“後又兩為祕省房中官，恣展古集，往往咽嚔於任（昉）、范（雲）、徐（陵）、庾（信）之間。有請作文，或時得好對切事，聲勢物景，哀上浮壯，能感動人。”他對於梁陳任昉、范雲、徐陵以及由梁入北周的庾信，被人推重的駢文家，都加以嗤笑，可見他並不滿意於他們的駢文。他的駢文，調諧聲律，有氣勢，善寫景物，感情昂揚而強烈，能感動人。駢文講對偶聲律，却寫得有氣勢，這很難辦到。加上“哀上浮壯，能感動人”，正說明他的駢文是駢散兼行，得錯綜之美，富有情韻的。

在《重祭外舅司徒公（岳父王茂元）文》裏說：

苟或以變而之有（指生），變而之無（指死），若朝昏之相交，若春夏之相易；則四時見代，尚動于情，豈百生莫追，遂可無恨。

這樣的駢文所謂有“聲勢”，既有聲律，又有氣勢，雖有對偶，已使人忘其對偶，已經超越了駢散的隔閡，富有感情，不再爲任、范、徐、庾所限了。

再像《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》：

帝又曰：“舜何人也？回何人哉？朕思丕承，汝勉善繼，無忝乎爾之先！”公復拜稽首曰：“《易》曰‘中心願也’，《詩》曰‘何日忘之’，臣敢不夙夜在公，以揚鴻烈。”

這正是駢散兼行，在對偶中引語來表達兩人的心情，措辭得體，無駢文本滯的毛病。

又同篇寫澤潞帥劉從諫死，他的姪子劉稹抗拒朝命，據地自立，德裕主張發兵進討道：

公乃挺身而進曰：“重耳在喪，不聞利父；衛朔受貶，祇以拒君。今天井雄藩，金橋故地，跨搖河北，脅倚山東。豈可使明皇舊宮，坐爲污俗，文宗外相，行有匪人？”忠謀既陳，上意旋定。

這裏也是駢散結合，以駢爲主來敘述德裕提出討伐的論點，由於用典貼切，借典故來發議論，能這樣得心應手，極見商隱的工於駢文，敘事議論，無不如意。

商隱的駢文，還有即景抒情。如《謝河東公（柳仲郢）和詩啓》：

某前因暇日，出次西溪，既惜斜陽，聊裁短什。蓋以徘徊勝境，顧慕佳辰，爲芳草以怨王孫，借美人以喻君子。

這裏雖是駢文，幾乎不覺得在用典，芳草王孫，美人君子，當時人熟極，已成常識。這裏情景結合，又寫出作者的用意，有情韻之美。

又有即事抒情的，如《上河東公啓》：

至於南國妖姬，叢臺妙妓，雖有涉於篇什，實不接於風流。
況張懿仙本自無雙，曾未獨立，既從上將，又託英僚。汲縣勒銘，方依崔瑗；漢庭曳履，猶憶鄭崇。寧復河裏飛星，雲間墮月，窺西家之宋玉，恨東舍之王昌。誠出恩私，非所宜稱。

這是商隱妻死後，府主柳仲郢把無雙的歌女張懿仙嫁給他，他寫信婉謝。即事抒情，情文並茂。其中“雖有涉於篇什，實不接於風流”，成為研究商隱豔情詩的重要準則。這段寫得情意真摯，終於使柳仲郢打消了他的用意。

論駢文的，首推劉勰《文心雕龍·麗辭》，他推本自然：“造化賦形，支體必雙。”雙是出於自然，奇也是出於自然，四肢是成雙的，頭和軀幹又是奇的，奇偶配合，更合於自然，所以他指出“奇偶適變，不勞經營”。又說：“若氣無奇類，文乏異采，碌碌麗辭，則昏睡耳目。必使理圓事密，聯璧其章，疊用奇偶，節以雜佩，乃其貴耳。”對駢文要求“理圓事密”，已經不易；還要求有氣勢，要求“疊用奇偶”，合於自然美的法則，奇偶錯綜，這是極高的要求。商隱的駢文完全做到了這一步。正因為他的駢文達到了這樣的成就，所以錢先生提出了商隱以駢文為詩。

在這裏，附帶談一下商隱的古文。他在《樊南甲集序》裏說：“樊南生十六，能著《才論》、《聖論》，以古文出諸公間。”他在年輕時就以古文著名。章學誠《李義山文集書後》：“義山古文，今不多見。集中所存，如《元次山集序》、《李長吉小傳》、《白傅墓誌銘》，其文在

孫樵、杜牧間；紀事五首、析微二首，頗近元、柳雜喻，小有理致。大約不能持論，故無卓然經緯之作，亦其佐幕業工，勢有以奪之也。”他把商隱的古文排列在孫樵、杜牧間，把商隱的小品文，認為接近元次山、柳宗元的雜喻，這個評價是符合實際的。孫樵的古文，錢子泉師《韓愈文讀》稱為“清言奧旨，出以鎔鑄，筆峭而韻流”，“以筆勢緊健為奇”。杜牧的古文，也是筆峭韻流，可以用來說明商隱古文的特點。商隱古文在思想上更有特出表現。他在《上崔華州書》裏說：

夫所謂道，豈古所謂周公、孔子者獨能耶？蓋愚與周、孔俱身之耳。以是有行道不係今古，直揮筆為文，不愛攘取經史，諱忌時世，百經萬書，異品殊流，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！

商隱講的道，主張親身體會，認為自己同周公、孔子都在親身體會，不主張學習周公、孔子的道。對於作文，他不肯居於經史百家之下，要從親身體會中直揮筆為文。這是一方面。他在《與陶進士書》裏，又說：“嘗於《春秋》法度，聖人綱紀，久羨懷藏，不敢薄賤。聯綴比次，手書口詠。”這又是一方面。他既辛勤地學習古代的著作，又不以它為限，要注重親身體驗。又贊賞劉迅說的：“是非繫於褒貶，不繫於賞罰；禮樂繫於有道，不繫於有司。”把理論上的是非有道同王朝的賞罰禮樂分開，把是非有道看得高於王朝的賞罰禮樂。這些見解在當時是非常突出的。跟當時人只看重向周公、孔子學道，向經史百家學文，只尊重朝廷的禮樂賞罰的不同，說明他的見識高出於當時人。他既尊重孔子的《春秋》，又不局限於學孔子之道，這也顯示他的辯證觀點。

商隱的這種觀點，在《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》裏也有闡述

道：“而論者徒曰：次山不師孔氏爲非。嗚呼！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？”“孔氏固聖矣，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！”這是對道要靠親身體驗的說法。又說：“次山之作，其綿遠長大，以自然爲祖，元氣爲根，變化移易之。”即不論學道學文，都是效法自然，即反對從經史百家中學文的意思。這也說明他的駢文，“往往啞嚙於任、范、徐、庾之間”，所以有新的成就。

（二）以駢文爲詩

錢鍾書先生提出“商隱以駢文爲詩”，這是前人從未談到過，亦見錢先生論學多創闢之見。他在信裏說：“樊南四六與玉溪詩消息相通，猶昌黎文與韓詩也。楊文公（億）之崑體與其駢文，此物此志。末派擗摭晦昧，義山不任其咎，亦如乾隆‘之乎者也’作詩，昌黎不任其咎。所謂‘學我者病’，未可效東坡之論荀卿李斯也。”

商隱論詩，見於《獻侍郎鉅鹿公啓》：“夫玄黃備採者綉之用，清越爲樂者玉之奇。固已慮合玄機，運清俗累；陟降於四始之際，優游於六藝之中。”他是主張文采音韻，還要求合乎自然的變化，清除庸俗的思慮。這些說明，他的駢文與詩是消息相通的。他的詩與駢文都寫得玄黃備採，音韻鏗鏘，善用比喻，思合自然。他在駢文和詩裏，都把議論、敘事和典故結合，如《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》：

遙作時多難，先令禍有源。初驚逐客議，旋駭黨人冤。密侍榮方入，司刑望愈尊。皆因優詔用，實有諫書存。苦霧三辰沒，窮陰四塞昏。虎威狐更假，隼擊鳥愈喧。

從蕭瀚的貶斥中看到禍難發作的根源，屬於黨禍，含冤被貶。蕭瀚以有諫書，選拔爲刑部侍郎，豈意在小人的蒙蔽中，使朝廷昏暗，狐假虎威，終遭搏擊，被貶斥。這裏就把說明、議論、抒情同典故結

合，用典和對偶都很靈活，避免板滯。他的駢文也這樣，如《爲濮陽公與劉稹書》：

語有之曰：政亂則勇者不爲鬪，德薄則賢者不爲謀。故吳
淠有奸而鄒陽去，燕惠無德而樂生奔。晉寵大夫，卒成分國之
禍；衛多君子，孰救渡河之災。此之前車，得不深鏡。

這裏的引事引言都跟議論和說理結合，引事不但不覺堆砌，反而起到例證的作用，完全化板滯爲靈活。

詩裏還結合典實來抒情，如《淚》：

永巷長年怨綺羅，離情終日思風波。湘江竹上痕無限，峴
首碑前灑幾多。人去紫臺秋入塞，兵殘楚帳夜聞歌。朝來灞
水橋邊問，未抵青袍送玉珂。

以上六句用了六個下淚的事，祇在結句點明正意，正對李德裕被貶官說的，指青袍寒士送貴人李德裕貶官時的悲痛，勝過以上各式各樣的悲痛。有這一轉，以上的各種下淚，不再成爲堆砌，起到襯托作用，加強抒情的力量。他在《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》裏說：

許靖廊廟之器，黃憲師表之姿，何晏神仙，叔夜龍鳳，宋玉
閒麗，王衍白皙，馬援之眉宇，盧植之音聲，此其妙水鏡而爲
言，託丹青而爲裕。

這裏彙集了許多典故，像才具、風姿、品貌、識鑒，用來說明李德裕的“慶是全德”，也是化堆砌爲靈活。祇是“慶是全德”放在前面，

“青袍送玉珂”放在後面罷了。運用這些典實，表達作者對德裕無限傾慕的感情。

再說商隱的詩，清新綺豔，挺拔凝鍊，跟他的駢文一致，這點在上文談駢文時已論及，下文談詩時還要談到。這裏試舉商隱駢文中用比喻的一例來作說明。在《獻相國京兆公啓》裏，提出“昔師曠薦音，玄鶴下舞，后夔作樂，丹鳳來儀”，認為別的人奏樂，不聞有鶴和鳳來，難道鶴和鳳對師曠、后夔“或有所私”，“不能無黨”，舉了兩個比喻，提出了疑問。第二段講京兆公杜悰贊賞詩文，是“師曠之玄鶴，后夔之丹鳳”，指出師曠、后夔比作者，玄鶴、丹鳳比杜悰。第三段講自己向杜悰獻詩，得到贊賞，歸到“是以疑玄鶴之有私，意丹鳳之猶黨者，蓋在此也”，歸結到“故欲仰青田（指鶴）之紋感，瞻丹穴（指鳳）以興懷”，表示對杜悰的感激。這樣用了兩個比喻提出疑問，貫穿全篇。既用玄鶴、丹鳳來贊美杜悰，又用師曠、后夔來自佔身份。全篇就是圍繞這兩個比喻寫的。這種寫法，在詩裏也有，如《玉山》：

玉山高與閬風齊，玉水清流不貯泥。何處更求回日馭？此中兼有上天梯。珠容百斛龍休睡，桐拂千尋鳳要棲。聞道神仙有才子，赤簫吹罷好相攜。

玉山、玉水比令狐綯的地位崇高而清貴。回日馭、上天梯，比綯有回天之力，可以推薦人入朝。珠容百斛和桐拂千尋比喻朝廷可以容納大批人才。神仙的才子比綯，相攜比盼望綯的提攜。“何處”是提出問題，上天梯是回答。龍比綯，鳳比自己，點出自己的願望。全篇通過比喻來寫，說明自己用意。同玄鶴、丹鳳比李悰，師曠、后夔自比，通過疑問來表達正意的寫法相似。從風格、辭藻到諷喻的

手法，可以看到商隱的以駢文爲詩來。

（三）“筆補造化”“選春夢”

商隱的傑出成就自然是詩，他的詩的美學觀點可以用錢先生的兩段話來作說明。錢先生《談藝錄》論李賀詩：

長吉《高軒過》篇有“筆補造化天無功”一語，此不特長吉精神心眼之所在，而於道術之大原，藝事之極本，亦一言道著矣。夫天理流行，天功造化，無所謂道術學藝也。學與術者，人事之法天，人定之勝天，人心之通天者也。

錢先生講藝術，分法天，即摹仿自然；勝天，即勝過自然；通天，即通於自然。藝術首先是摹仿自然，但僅限於摹仿還不够，《文心雕龍·物色》裏說：“物色盡而情有餘者，曉會通也。”物色有盡，光是摹仿自然的物色是會窮盡的，所以要情景結合，補造化的不足，這就是勝天，就是“筆補造化天無功”。但這種勝天有一定的限度，不能漫無限制，這種限度就是通天，即通於自然，超於自然而又合於生活真實，不背離自然。

錢先生在《談藝錄補訂稿》裏說：

長吉尚有一語，頗與“筆補造化”相映發。《春懷引》云：“寶枕垂雲（髮）選春夢。”情景即《美人梳頭歌》之“西施曉夢綃帳寒，香鬢墮髻半沉檀”，而“選”字奇創。曾益注：“先期爲好夢。”近似而未透切。夫夢雖人作，却不由人作主。太白《白頭吟》曰：“且留琥珀枕，或有夢來時。”言“或”則非招之即來者也。唐僧尚顏《夷陵即事》曰：“思家乞夢多。”言“乞”則求而不必得者也。放翁《蝶戀花》亦曰“祇有夢魂能再遇，堪嗟夢不由

人做”。作夢而許操“選”政，若選將選色或點菜點戲然，則人自專由，夢可隨心而成，如願以作（弗洛伊德論夢為“願欲補償”）。醒時生涯之所缺欠，得使夢完“補”具足焉，正猶造化之以筆“補”矣。

醒時所得不到的願慾，在夢中得到補償。但夢不由人做主，詩人却能選夢，使不由人做主的夢。通過創作得以實現。這也是筆補造化。從“筆補造化”到“選夢”，都是錢先生論藝術創作的特點。這種特點也表現在商隱的詩裏。

商隱的詩有摹寫自然的。

日射紗窗風撼扉，香羅拭手春事違。回廊四合掩寂寞，碧鸚鵡對紅薔薇。（《日射》）

無事經年別遠公，帝城鐘曉憶西峯。烟爐消盡寒燈晦，童子開門雪滿松。（《憶住一師》）

這兩首詩都是摹寫環境的，“碧鸚鵡對紅薔薇”，紅碧映照極寫色彩的鮮豔；加上回廊四合，想見屋宇的環抱；“日射紗窗風撼扉”，日光明淨，風吹不到；香羅拭手，雖在拭手時還用香羅帕，寫出其中的一位婦人來。這是從她的居處、花鳥、用物來襯出她的富麗生活，是摹寫她所處的生活環境。在“春事違”和“掩寂寞”裏又寫出她孤獨寂寞的心情。那末他的反映生活，不光寫了生活環境，還寫出人物的心情來。另一首寫住一師，爐烟消盡了，燈暗了，門外松樹上積滿了雪，這也摹寫了住一師的生活環境，寫出一種高寒清冷的境界，從這個境界裏襯出住一師清高絕俗的品格來。通過生活環境來寫人物，寫出人物的心情或品格，從中表現出商隱對婦人的同情

和對住一師尊敬的心情。這樣的反映生活，是摹寫自然而又不限於摹寫自然。因為婦人和住一師的生活環境，接觸他們的人都可以看到，但他們的心情和品格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，從生活環境中寫出人物的心情和品格來，已經超過了摹寫自然。不過這樣寫，其他著名的詩人都可達到，不能顯示商隱詩的特色。

再就摹寫自然說，像蘇軾《西湖》：“畢竟西湖六月中，風光不與四時同。接天蓮葉無窮碧，映日荷花別樣紅。”這是看到自然之美，把它摹寫出來，是摹寫自然的佳作。再看商隱的《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衮》：“竹塢無塵水檻清，相思迢遞隔重城。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。”荷花的盛開和枯落這是自然，贊美盛開的荷花，這是摹寫自然之美。這首詩結合自己的心情，希望秋陰不散，能够下雨，要留得枯荷來聽雨聲，這種獨特的想望，表達出他的獨特感受，對雨打枯荷聲的愛好，是不是對盛開荷花的贊賞的一種補充。這種補充，是商隱所獨創，是不是“筆補造化天無功”？但又符合自然。這詩所表達的風格，還不是商隱所獨具的風格。

商隱的《錦瑟》詩：“莊生曉夢迷蝴蝶，望帝春心託杜鵑。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烟。”莊周想望的逍遙遊，在現實生活中只是一種想望，是很難實現的，他通過曉夢，化為蝴蝶，實現了他的栩栩自得的逍遙，這就是選夢，這種選夢也是補造化的不足。望帝的春心無法永遠表達出來，寄託到杜鵑的哀鳴裏，就可以長期不斷的表達出來，這又是一種補造化。珠圓玉潤，這是自然之美，歸功於造化。但玉冷珠圓，是沒有感情的。珠不會生出熱淚來，玉不會有蓬勃如烟的生氣。詩人使珠有情，有熱淚，玉有生氣，玉生烟，這是“筆補造化天無功”。這種筆補造化是不是又符合自然呢？莊周有逍遙遊的想望，因而見於夢中，這是符合自然的。望帝的哀怨使人感念不忘，因聽到杜鵑的哀鳴，就想像出望帝化為杜鵑的神話，

這也是符合神話產生的自然的。珠雖然沒有熱淚，但人們往往稱熱淚為珠淚，以淚比珠，因此想像珠有淚也是自然。玉是冷的，但人們想像藍田日暖時，蘊藏的良玉一定有所表現會生出烟來，這也是自然的。所以這些話雖然是筆補造化，但又符合人民心意的自然，是補天而通於自然的。這又是商隱的創造。因為“迷蝴蝶”的不是莊生，是作者，是作者在“思華年”中有栩栩自得的情事，但這種情事却像莊生的曉夢。“託杜鵑”的不是望帝，是作者，是作者一生中有像望帝的哀怨，託杜鵑來哀鳴。“珠有淚”不是一般說的珠淚，一般人說的“珠淚”不過說淚如珠，是一種比喻，其實並沒有珠。“珠有淚”是作者的創造，跟“玉生烟”一致。“玉生烟”不是“玉化烟”，玉化烟是玉化為烟，玉已經消失了。也不真是“良玉生烟”，因為這裏不在講珠玉，在講他自己的作品，既珠圓玉潤，又有熱淚和蓬勃生氣（見《錦瑟》說明，用錢先生說），所以是創造。這種創造，是筆補造化而又合於自然，即補天而又通天，貫徹了商隱的美學觀點。這種美學觀點，構成了商隱詩的獨特風格，擴大了唐詩中的境界，成為商隱詩在藝術的獨特成就。

錢先生在《談藝錄》裏又接着說：

莎士比亞嘗曰：“人藝足補天功，然而人藝即天功也。”圓通妙澈，聖哉言乎！人出於天，故人之補天，即天之假手自補；天之自補，則必人巧能泯；造化之祕，與心匠之運，沆瀣融會，無分彼此。

這是對“人心之通天”作進一步闡述。“人事之法天”是摹仿自然，這種摹仿就創作說，要像“清水出芙蓉，自然去雕飾”，不露斧鑿痕跡而出於自然。不論是色彩鮮豔的“碧鸚鵡對紅薔薇”，或意境高

寒的“童子開門雪滿松”，都是自然而沒有斧鑿痕的。在“人定之勝天”裏即“人之補天”，這種補天即“天之假手自補”，就假手於人來說，還是人的補天，還是“筆補造化天無功”，還是作家的創造；就“天之自補”來說，這種“筆補造化”又要求“人巧能泯”，出於自然，不是刻意雕飾。商隱的《無題》詩，不是雕繪滿眼，而是寫得補天功而泯人巧，合於自然，像“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”，“風波不信菱枝弱，月露誰教桂葉香”，“身無綵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”，都做到了“造化之祕與心匠之運沆瀣融會，無分彼此”，達到“人心之通天”的藝術境界。

商隱論詩，在前引《獻侍郎鉅鹿公啓》裏提出“慮合玄機”，已經看到“造化之祕”，要求匠心獨運合于造化之祕。“玄機”即造化之祕，《莊子·至樂》：“萬物皆出於機，皆入於機。”疏：“機者發動，所謂造化也。”玄是玄妙，所以“玄機”是造化之祕。機要注意它的發動，即看到造化變動的苗頭，要求心思符合這種苗頭，在這裏雖然商隱不可能有錢先生那樣深刻而明確的美學觀點，但他已經能夠提出“慮合玄機”，那末他在藝術上達到“人心之通天”，他對這種高度的藝術境界應該不是毫無感覺的。

（四）“轉益多師是汝師”

在《獻侍郎鉅鹿公啓》裏，商隱論唐詩說：

我朝以來，此道尤盛，皆陷於偏巧，罕或兼材。枕石漱流，則尚於枯槁寂寞之句；攀鱗附翼，則先於驕奢豔佚之篇。推李杜則怨刺居多，效沈宋則綺靡爲甚。

商隱論唐詩，一方面肯定“此道尤盛”，一方面又看到它的不足，“皆陷於偏巧，罕或兼材”。就題材說，寫山林的偏於枯槁，寫朝廷的偏